

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

——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黄凤春 胡刚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南公”见于大盂鼎、南公有司鼎和南宮乎钟等铜器铭文，学界一般认为“南公”之“南”应是“南宮”的省称。根据《左传》及《白虎通》引《诗传》而知，南公有可能就是周武王十兄弟中最小的聃季载，“聃”与“南”为通假字。称南公应是原居于周宮中的南宮，又封于南土的采邑而得名。叶家山 M111 中再次出土了一件“狁乍刺(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铜簋。“南公”铭文在南土的再次发现，对探讨其族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依据。从铭文可知，“南公”为曾侯狁的父辈。结合大盂鼎铭文并综合年代分析，曾侯狁与孟可能为叔侄关系。如此则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

关键词：西周金文，南公，南宮，叶家山，曾国，姬姓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4)02-0050-07

一、南公与汉东曾国

“南公”首见于大盂鼎。相传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铭文中纪年为二十三年，学界大多认为是周康王二十三年。铭文记录的是周康王对孟的告诫与厚望。从铭文语气上理解，康王是以周王圣人之德来教育同姓子弟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孟与周王是同姓贵族^①。我们注意到通篇铭文中三次出现了“南公”，即“井(刑)乃嗣祖南公”、“赐乃祖南公旂”、“作祖南公宝鼎”。从铭文内容可知，孟应是“南公”之孙。而“南公”与康王也应有至亲关系。孟鼎铭文所反映的康王与孟的关系非同一般，值得注意。

解放后，有关“南公”的铜器铭刻不断增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宮乎钟和南公柳鼎。其中南宮乎钟铭文如下：

司土南宮乎乍大林协钟 兹钟

名曰无昊，先且南公、亚且公中(仲)，必父之家。天子其万年眉寿，峻永保四方，配皇天，乎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乍朕皇且南公、亚且公中(仲)。(《集成》00181)

该钟于 1979 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豹子沟。其年代大约在西周晚期的宣王之世。从“南宮乎钟”铭文看，司徒南宮乎直言“南公”为其先祖，可知“南公”之“南”应是“南宮”的省称。“南宮”应是氏称，其来源应是以邑为氏，与西周早期的“南公”同源。南公柳鼎属厉王时器，显然也是以南宮为氏，也可能就是西周早期“南公”的后裔。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南公”之“南”应是“南宮”的省称，因此金文中的“南公”与“南宮”的涵义应是等同的。“南宮”在西周金文中多见，早在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的中方鼎(《集成》02751、02752)和中觶(《集成》02751.1、006514.2)中就有发现。此外还见于甶乍父已

作者：黄凤春、胡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觶(《集成》06504)、叔鬯斝作南宫鼎(《集成》02342)、吴王姬鼎(《集成》02600)、白乍南公簋(《集成》03499)等,晋侯墓地 M6081 还见有两件南宫姬鼎^[2]。在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242 的“柞伯簋”上也见有“南宫”的铭刻,这些“南宫”和“南公”铭文出土地域不同,分属不同的时代,所指是否为一人或一族尚值得研究,但“安州六器”的“中方鼎”和“中觶”所见的“南宫”铭文仍能为我们提供诸多信息。

根据唐兰等人的研究,中方鼎和中觶为昭王南征时器。需要指出的是,“中方鼎”铭文所记述的事应是昭王南征荆楚之事,而非伐虎方之役。首句铭文中的“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应是以事记年,根据楚简以事记年的通例,中先省南国征伐荆楚的前一年才是周王伐虎方的年代。中方鼎的年代约当在昭王的十八年,如果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 976 年上推,则昭王十八年应为公元前 978 年,而伐虎方的年代则是公元前 979 年。值得深思的是,商周王朝征伐反叛方国时除了王师以外,一般是以邻近方国为主力,虎方的区域我们曾推定在今汉水下游的盘龙城一带^[3],昭王之时,姬姓曾国已被封于汉东,以地域而论,汉东曾国与虎方邻近,获周王之命征伐虎方的“南宫”极有可能就是成康之际封于汉东的姬姓曾国。我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主要是基于“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觶铭文,据中觶记载:

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

王赐中马自侯四鬣,南宫祝。

王曰:“用先”。中扬王休,用作父

乙宝尊彝。

铭文讲述周王南征归来,在唐国举行周王宗亲振旅的庆典,周王赏赐给中四匹马,由南宫来执行。唐国为姬姓,地约当在今随州唐县镇,与曾国临近。南宫前来参与周王的同姓参与的“公族”庆典,一方面可能显示“南公”为周王同姓贵族,同时也可以看出凡与南土有关的事宜都有“南宫”的身影。南宫在中觶铭文中出场,显示出其作为该地重要封国在尽力扮演“地主之谊”的角色,亦暗示“南宫”确与汉东曾

国有关联。

二、南公的族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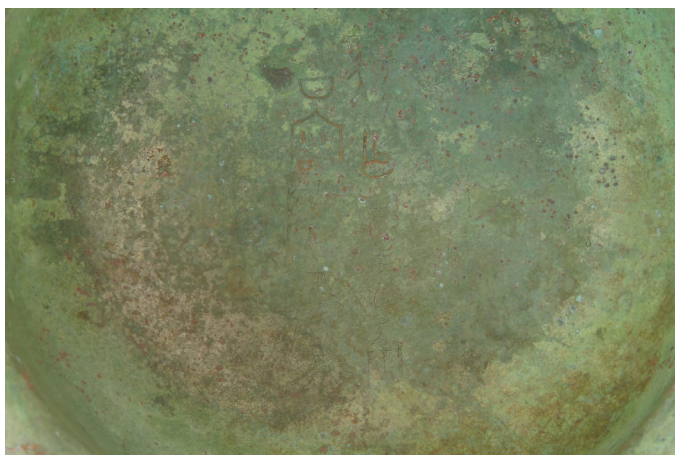
“南宫”作为氏称在西周初年即已存在。据《尚书·君奭》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郑玄注:“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宏夭、散宜生、南宫括及文母。”南宫括亦作南宫适,或南宫忽,是周初辅佐文王、武王的重臣之一。有关南宫氏的族姓,一些学者在探讨时意见很不一致,大致有姬姓说、东方氏族说两种^[4]。除此之外,据史书记载,还有另外两支南宫氏。其一是春秋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阅,因其居住在南宫,其后代遂以其居住地命姓,称南宫氏。另一个是鲁国有个叫闾的人,因居住在南宫,遂以“南宫”命姓,称南宫闾,他的后人遂以南宫为姓,称南宫氏。显然,鲁国的姬姓南宫氏为晚出,应与周初的南宫氏无涉。

大盂鼎的“南公”其人,过去的学者大多没有具体考释,只有唐兰先生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中作过详说^[5]:

南公当即文王子聃季载,《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聃季载最少”。《左传·定公四年》说:“聃季为司空”。聃字作聃。是成王时曾任三公。《白虎通·姓名说》:“文王十子,《诗传》曰: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处、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载。载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成、霍、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按南公有司盬鼎,是西周后期器,为南公的属官所做。《春秋·隐公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可见南季氏到春秋还存在。那么,冉季载或聃季载都应作南。冉和聃都是借用字。聃季当以作南季为正。南季载即南公。



图版一 M111:67 方座簋



图版二 M111:67 方座簋铭

孟则是聃季之孙。

唐兰先生考释的孟鼎中的“南公”即为武王弟聃季载，“聃”与“南”为通假字。称南公应是因采邑而得名。其主要依据的是《左传》和《白虎通》所引《诗传》史料，可见唐先生不以相对成书较晚的《史记》为依据是相当审慎的。我们认为唐先生的考释至为精当，武王弟聃季载可能在周宫应是居住于南宫而得以命氏，在周初又被分封于南土有关，南公后来又具备因采邑而氏的涵义，聃季载实应称“南季载”。这与周初所分封的“毕公”、“康公”等因封地于“毕”和“康”而称公应是一样的，“南公”为武王弟聃季载应无疑问。于此可见，孟与南公、康王都有

血缘关系，属周王室宗亲。

基于上述，我们怀疑见于《尚书》的南宫适可能就是聃季载。这里需要辨明的是，一些文献记载所记文王贤臣多非本族人，如《帝王世纪》：“文王昌……延四方之士……是以大颠、闾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以及《墨子·尚贤》：“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闾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于是，有人一定会得出南宫非姬姓。事实上，聃季载作为文王的最幼子，一定深得文王的宠爱和重用，将其列为四臣之一未尝不可。再者，《尚书·泰誓》所记武王“予有乱臣十人”中有半数为周王同姓族人。因此我们说《尚书》的南宫适为武王幼弟聃季载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叶家山M111所见的南公

2013年，在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在M111号大墓中的一件铜方座簋上（图版一），我们再次见到了“南公”的铭文。其铭文为（图版二，拓片一）：

犷作剌（烈）考南公宝鬯彝

M111是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在多件铜器上见有“曾侯犷作宝鬯彝”的铭文，从墓葬规格和规模以及随葬品的数量等方面，都可证明墓主应为西周早期的曾侯犷^[6]。铭文显示这件簋应是曾侯犷为其父南公所作的祭器。“南公”的再次发现，对判定叶家山曾国墓葬地的族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依据。

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发现后，有关其族属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除发掘者及部分学

者认为是姬姓外^[7]，很多学者都从墓葬头向、铜器日名、腰坑等方面否定叶家山曾国墓葬为姬姓^[8]。我们认为判断叶家山墓地的族属应着眼于墓地本身的出土文字材料及相关的历史背景，而不应以在典型周墓中都有的墓葬头向、铜器日名、腰坑等一些具有高风险的不定因素作为否定的依据。叶家山 M111 所见铭文“南公”与大盂鼎所见铭文中“南公”应当是解开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族属的突破口。

当然，在谈到大盂鼎的“南公”与叶家山 M111 簋铭的“南公”时，人们一定首先会提出这两个“南公”是否为同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两个“南公”应为一入，其主要依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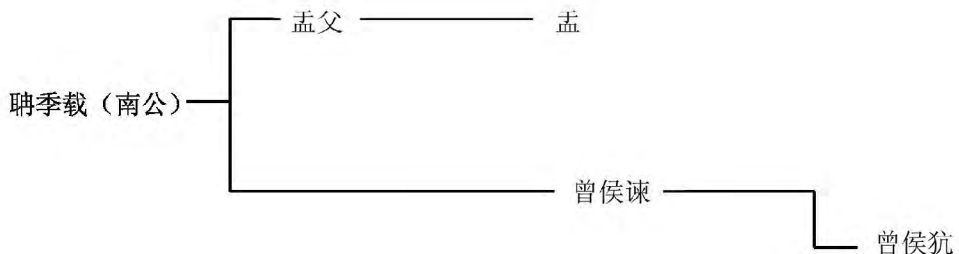
首先，二者年代相当。“大盂鼎”的年代为康王时期，叶家山西周墓葬的年代大体也在成、康、昭时期。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孟与南公的关系是祖孙关系，而曾侯猷与南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样曾侯猷应比孟高一辈。这又牵涉到了孟与曾侯猷究竟是父子关系还是叔侄关系的问题。根据叶家山西周墓葬的初步分期，曾侯谏墓要早于曾侯猷墓，曾侯猷的年代可能到了昭王之世。而孟却要早于曾侯猷。因此我们认为，孟可能与曾侯猷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叔侄关系。也就是说，孟当是南公的另一支，极有可能是孟父与曾侯谏和曾侯猷是兄弟关系，而曾侯谏和曾侯猷可能是兄终弟及的关系。其可能世系应如下表^[9]：

根据《左传》和《史记》记载，聃季载为文王十子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在成王时曾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应属辅佐文王和武王的周王室宗亲之一。从相关历史背景推知，大约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因聃季载有功于周室且又是周王室的宗亲而被封到了南土，其受封的年代大约在成康之际。而这一年代的推定，正好与叶家山西周墓葬的年代相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聃季载被封于南土的曾国而称为“南公”，就如同召公被封于燕、周公被封于鲁，而本人并未到其采地，而是以其子赴任一样，曾侯谏和曾侯猷等曾侯则成了南土的实际统属者。

其次，据下引文峰塔墓地出土编钟铭文记载，曾国的先祖与周王同姓，也曾是辅佐文王和武王的大臣，在武王灭殷后，理应得到分封。有关曾国的先祖情况，我们过去并不知道，2009 年随州市博物馆在随州城东的文峰塔墓地配合城市建设时曾采集到 6 件编钟，这些编钟虽大多残破，但重要的是编钟上大多有铭文^[10]。其中，1 号编钟铭文开篇为：

佳(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腴
曰：白(伯)彘(适)上帝，左右文、
武(正面征部)，達殷之命，羸(撫)
(斂)(定)天下，王遣命南，宅内土，
君此淮夷，臨有江夏(夏)周室之即
(既)卑(正面左鼓)……

文王 —— 武王 —— 成王 —— 康王 —— 昭王
(前 1046~前 1043) (前 1042~前 1021) (前 1020~前 996) (前 995~前 977)





拓片一 M111:67 方座簋铭文拓片

新见编钟铭文虽然不全,但可以知道所记之事应是春秋晚期吴楚攻伐之事。从所记战事看,编钟的年代当不早于公元前506年,大约为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晚期,器主应为曾侯臝。比较重要的是曾侯臝开篇追述了其先祖曾经辅佐过文王和武王,并参与了灭殷之战。从铭文中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曾侯先祖与周王室的关系。从叶家山M111所见曾侯犷为其父“南公”所作之器分析,只有武王弟聃季载才是符合“南公”身份的曾国的始祖。由此可见,西周早期汉东曾国应为姬姓。

再次,从周初分封背景分析。在武王灭殷后,一些曾经辅佐过文王、武王的周之宗亲和异姓臣僚都首先得到了分封。《左传·昭公二

十六年》：“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故周初的分封之世大体结束于康王之世。如封吕尚于齐，封周公旦伯禽于鲁，封成王弟于唐（晋），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等。就连楚之先祖亦因“鬻熊子事文王”有功而被封于楚蛮。值得注意的是，周初绝大多数的封国，都是在原有的一些旧国中重新分封的。如燕、卫、鲁、唐（晋）、荆楚等。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西周南土中的曾国理应也是在原有的曾国基础之上重新分封的。从周初的若干沿用旧国名进行重新分封，反映了周初的分封应是带有强制性的。原有的旧国可能被灭或迁徙或臣服新的封国。一些学者在否定汉东的曾国为姬姓时，完全是拘泥于原地曾经存在着一个姒姓曾国的框框。这是有违西周初年分封的机制和周人治国的理念的。可以推知，在周人的“四土”中，其东、北、西都有周人的宗亲封国，而唯有南土空阙，是与《左传》所言的“汉阳诸姬”的政治地理格局相扞格的。

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所发掘有140座墓葬中，我们一共见到了20多种并多达60余件不同的族氏和方国铭文铜器。其中，绝大多数族氏和方国都是商代北方或东方的一些族氏。这些诸多异国铜器同出于一个墓地中，这在全国已发现的西周墓地中是极其罕见的。也正因此，成为部分学者否定叶家山为姬姓说的一个证据之一。有关这一现象，我们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这个曾国非同一般，恰巧证明了它与周王室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众所周知，古代异域铜器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而言，除了婚姻和馈赠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战争掠夺。当我们从若干出土文字材料及其周初的分封背景中得出叶家山的曾国为周王室的宗亲，合理的解释就是战争掠夺。从曾侯钟我们知道了曾国的先祖曾参与灭殷战争，因其有功于王室，并从王室分得了诸多铜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器说”，《尚书·分器》就有：“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古

代的灭国战争多带有掠夺的政治色彩的,在文献中我们常见有“毁其宗庙,迁其社稷”^[11]和“分其室”^[12]之说。人们试想,一个极为普通,又处于边僻的夏商时期的姒姓曾国是不可能如此之多的异国铜器的。于此,诸多族氏和方国铜器则可成为叶家山西周曾国为姬姓说的又一坚实的辅助证据。

最后,还有一条相关的史料尚需辨析。据《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欲取狄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今王外利矣,其无乃阶祸乎?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杞、缙由大妘,齐、许、申、吕由大姜,陈由大姬,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昔郟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媯,郟由叔妘,聃由郑姬,息由陈妘,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媯,是皆外利离亲者也。’”其中的“聃由郑姬”是说聃国和郑国皆为姬姓,聃国因娶了郑国的女子而犯了同姓婚姻之大忌才致灭亡。“聃”又作“丹”,有关聃国多认为武王弟聃季载的封国,对其封地大致四说,一是汉西的湖北荆门那处,二是河南平舆的沈亭,三是河南开封的“聃亭”,四是陆浑东南的南水说。学界多认指西周的聃国当在汉水以西的湖北荆门的“那处”为宜^[13]。由叶家山西周墓地得出汉东曾国才是聃季载的封地后,那么,富辰所说的“聃”似为另出,与聃季载无涉。由此可看出,历史上对于聃国与聃季载之间的若干纷争似可终结。

*本文写作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曾国文字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1AZS002)资金资助。

注释:

[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3]黄凤春《盘龙城与商代的虎方》,2013年武汉盘龙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即将出版。

[4]沈长云、何燕杰《谈南宫氏的族姓及相关问题》,

《寻根》2008年2期。

[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初版,第170页注40。

[6]黄凤春、郭长江、陈晓坤《随州叶家山二期考古发掘再获大批西周青铜器》《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25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叶家山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

[7]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期。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7期。c.黄凤春《湖北境内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及相关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2013年11月。d.黄凤春、黄建勋《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12月。e.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文献》,2012年3期。f.黄凤春《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发掘的主要收获》,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平8月。g.张国硕、王琼:《试析夏商周时期的曾国》,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平8月。

[8]a.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翰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11期。b.杨升南《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国的族属问题》《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日3版。c.刘绪《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d.管浩波《汉东的、曾国和随国考》,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平8月。e.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f.李伯谦《西周早期的重大考古发现》《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12月。g.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12月。h.曹芳芳《两周时期曾国及族属考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十九期,2013年12月。

[9]附表中的王位年代数据依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10]随州市博物馆采集资料。

[11]《春秋·庄公四年》孔疏。《孟子·梁惠王下》。

[12]《国语·楚语上》《左传·成公七年》《左传·襄公十九年》《左传·昭公十年》《左传·定公十年》。

[13]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

A Study on the Southern Duke 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Zhou: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lan of the Zeng State Cemetery in the Yejiashan Site, Suizhou

Huang Fengchun Hu Gang
(Wuhan, Hubei 430077)

Abstract: The bronze inscription Nan 南 of Nan Gong (the Southern Duke)南公, recorded in the Da Yu's Ding-tripod 大盂鼎, the Nan Gong You Si's Ding-tripod 南公有司鼎, and the Nan Gong Hu's Bell 南宮乎钟, actually refers to Nan Gong 南宮(the Southern Palace). The Southern Duke's name may have been Dan Ji Zai 聃季载,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King Wu of Zhou, since Dan 聃 and Nan 南 are two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The title Southern Duke may originate from the Southern Palace where the duke lived, and the Southern Territory where the duke's fief was located. The inscription 狁乍刺 (烈)考南公宝尊彝 recorded on a bronze Gui-vessel, excavated from Tomb M111 of the Yejiashan Cemetery, offers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analyzing the tomb's owner's clan. From studying the inscriptions, tomb size, and burial goods, the tomb belonged to Marquis Kang of Zeng, son of the Southern Duke. By combining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Da Yu's Ding-tripod 大盂鼎 and this study further concluded that Marquis Kang was one of the uncles of Yu, the owner of the Da Yu's Ding-tripod, thus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clan with the surname Ji 姬.

Key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Zhou, the Southern Duke, the Southern Palace, the Yejiashan site, the Zeng State, surname Ji

(责任编辑、校对 :凡国栋)

(上接第 62 页)

Three Questions on the Zeng State Cemetery of the Yejiashan Site

Feng Shi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main questions concerning early Zeng Stat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first question focuses on establishing the nam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marquis of the Zeng State, thus adding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his clan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to the genealogy. Second, reevaluate the owner of the Li Zi Ding-tripod, Li Zi Yao, referred to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marquis of Jian, with further focus on what each part of the name represent such Yao is his courtesy name, and Li Zi is the funerary name. Lastl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variations between Si Hu-vessel and Tian Hu-vessel, through artefact research.

Keywords: Western Zhou, Zeng State, Shi, Li Zi Ding-tripod, Si Hu-vessel, Tian Hu-vessel

(责任编辑、校对 :凡国栋)